

崛起 战略

崛起进程中的

中国式软实力壹

唐晋·主编

人民日報出版社

中 国 崛 起 大 战 略 的 高 端 论 剑

崛 起 大 战 略

崛起进程中的

中国式软实力 **壹**

唐晋·主编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剑: 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唐晋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80208 - 669 - 2

I. 崛…

II. 唐…

III. 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 中国 - 文集

IV. D6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7382 号

书 名: 论剑: 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

作 者: 唐 晋

责任编辑: 田玉香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版: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字 数: 241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08 - 669 - 2

定 价: 48.00 元

目 录

Contents

“软实力”,“硬形象”

-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软实力概念 /003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二——国家软实力 /024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三——区域软实力 /046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四——文化软实力 /056
靠品牌提高“软实力” /080
大学文化育人与国家软实力提升 /082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十大举措 /087
环境文化也是重要的文化软实力 /093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097
我们当怎样传播经典 /106
“国际化表达”带来了什么 /108
国际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表达 /112
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 /117



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

-
- 传统与现代文化价值的对立与统一 /123
 - 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当代价值 /126
 -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及其永恒价值 /131
 - 传统民间祭祀中的文化记忆 /138
 - 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41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144
 - 重新梳理传统节日文化脉络 /150
 - 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 /154
 - 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共生 /158
 - "孝"的现代困境 /163
 - 孝道与感恩文化 /166
 - 传统孝文化的建构与重构 /174
 - 应该肯定"京剧进课堂"的价值导向 /180
 - 汉字"申遗":如何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184

国学热中的“软实力”情结

-
- 什么是国学 /191
 - 国学应该是"大国学" /202
 - 近代"国学"的"洋"与"土" /204
 - 国学中的公正价值观 /206
 - 对"国学热"的双向思考 /209

- 国学热的冷思考 /213
国学热：“乍暖”是否“还寒” /216
国学研究焦点：儒学的价值及其现代化 /220

人文精神的回归与教育的缺失

- 文化的回归与超越 /227
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 /232
人文精神的缺失与“经典”的泛滥 /234
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 /238
大学：现代文明的轴心 /246
教育不应以精英为本 /257
悟道比求知更重要 /259

缔造和谐“软实力”

- 论“多元和谐文化观” /263
“和谐”的传统文化渊源 /267
正确认识建设和谐文化的几个关系 /270
把握建设和谐文化的基本要求 /273
大众文学与和谐文化的构建 /276
增强和谐文化的精神支撑 /281
和谐文化建设：从传统文化寻求创新动力 /285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本架构 /288
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291

加强区域和谐文化建设 /294

和谐文化与文化和谐 /297



后记 /299

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

壹



论 壳

『软实力』，『硬形象』





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一

——软实力概念

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

“软实力”(Soft Power) 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

在不同时期,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在 1990 年发表的“软权力”一文中,他指出:“同化权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在 2002 年发表的“为何再不能单纯依赖军事力量”(Why m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一文中,他认为软实力就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而在 2006 年发表的“软实力的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他将这一概念简单地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的行为,从而使己方得偿所愿的能力。另外,在 2004 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制

胜之道》一书以及 2006 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软实力”概念诞生以后,各方反应不一。各种意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概念本身持有疑问。例如,我国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不是很严密,其借助了计算机软件、硬件的区分思维,而事实上软件和硬件必须结合起来,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第二类是对“软实力”的功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并不像所描述的那样重要。例如,资深政治家约翰·麦克洛依(John McCloy)在谈及国际政治中要关注声望和吸引力时大发雷霆:“国际舆论?我不信国际舆论。唯一要紧的是力量!”美国专栏作家卡尔·托马斯(Cal Thomas)则表示:“说美国的言行能减少我们敌人的威胁性,这纯属虚构。”第三类是对这一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同意这类实力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的重要意义,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深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类反应占据主流地位。当然,认识到“软实力”概念的重要意义的人,在对于软实力的本质内容的看法上也还是立足点不一,或者各有侧重,从而存在分歧。

由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的民族的性格气质,中国学者倾向于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软实力”概念。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软实力是一国的内外政治动员能力,即对国内外硬实力的调动和使用能力。”这种看法不仅强调了软实力对外的维度,也包含了其对内的维度。还有观点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这种观点表现出更强的内向性。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认为,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约瑟夫·奈在提出和论述软实力时更多地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美国学者这样看有一定道理,符合美国的国情。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讨论软实力可能一方而要着眼于国际关系,另一方而要更

多地着眼于国内发展。另外,从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上看,一般而言,中国人更为内向或曰内倾,而美国人性格更加外向。古代的中国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周围没有可与匹敌的国家,中国人因此而自诩“天朝上国”。但是,这种突出的优势也并没有催生出中国人外向的性格,更没有因此而寻求对外扩张,恰好相反,它却造就了人们精神上的内向性。于是,在探讨软实力时,在“反求诸己”精神的指导下,国内学者不仅关注一国为达到目标而影响他国的能力,还考虑到了它整合、动员国内各阶层、各集团意志与力量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内学者更强调内部能力与外部能力并重的“软实力”。如果从综合对内对外两个维度而非单纯局限于对外维度的意义上探讨国家“实力”,也即综合性的国力,那么,国内学术界对“软实力”的理解相对来说更加全而、完整,只是这时候的“软实力”已经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对于理解“软实力”概念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准确把握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比较全面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存在如下联系。

一、硬实力为软实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其一,文化、价值观等的传播需要以物质为载体。首先,在现代社会,文化一般主要以文化产业为其物质载体。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存在互利共生的关系,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与发达的文化产业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离不开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后起之秀的韩国同样如此。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文化产业既是一种硬实力资源,又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基础。文化产业受益于潜在的文化软实力,从文化中获取养分,也实现着潜在的文化软实力,甚至创造性地提升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其次,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机构也构成一国文化的载体,为一国软实力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向国外民众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众多本部在美国

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将“美国”搬到了国外民众的家门口，以自己的言行体现、推介美国。原则上讲，每一个企业既是一国的硬实力资源基础，同时也是其软实力的物质载体和一个准文化宣传机构。再者，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宣传与推介也需要以一定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基础，美国控制着全球主要信息渠道，借以向全世界传达本国的观念和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推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在美国的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即便是作为最典型的硬实力资源的军队，也可以作为一国的软实力载体，宣传和推介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迄今为止，所有参加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维和军人都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联合国主管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格诺赞扬中国赴刚果（金）的维和部队是“中国对维护联合国宪章做出的光辉典范”。利比里亚总统约翰逊·瑟利夫称赞中国维和部队“是一支战斗力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高度职业化的部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友好使者”。在这里，最典型的强制手段反倒成了表达友善与合作态度的工具，有效地宣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政策。

重视环境的价值观同样也需要以环保产业为基础。环保价值与环保产业的发达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对环境的重视势必刺激环保产业的发展。没有较为发达的环保产业，环境价值观就没有依托，沦为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可以想象，一个重视环境保护的国家，不仅会发展出比较发达的环保产业，而且会在其他产业中贯彻环保理念，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地保护环境，这就类似于不仅文化产业体现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其他社会组织也具有这种功能。

其二，硬实力的发展可以推动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经济活力是其日益增长的实力的核心——不仅是硬实力的核心，而且是软实力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中国不得不承认是其经济增长唤起了全球人学习汉语的



热情。即便中国的文化具有经济利益之外的、独立的价值，国外的人们也最终会发现这种价值并被中国文化本身所吸引，但是至少大多数人的兴趣首先是被经济利益激发出来的，只是在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了解了这种文化之后才对文化本身产生兴趣，文化本身的魅力才得以彰显，价值才得以实现。没有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中国文化充其量只能吸引国外某些知识精英的青睐，存在于有限的学者书斋之中。这种局面还由于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限而进一步加剧。由于这种限制性，一般人只能够选择一种或者两种外国语来学习，一个或者两个其他国家来了解，这就使各国文化之间形成激烈竞争的关系，弱国很难获得其他国家民众的了解和认知，对外的文化软实力就无从谈起。更糟糕的是，由于人才逆向流动的缘故，本国高级人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更愿意放弃本土文化而改学外国语和文化。这不仅使得本国文化发展后劲不足，而且使得民族凝聚力也受到削弱。在这种意义上，硬实力的发展和强大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同样，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理念的巨大吸引力也依赖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高。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雄厚，其影响某个国家乃至左右世界局势的能力就越大，国际地位就越高，在人们思考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形势时，他就越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也就是说，他的利益，以及他对于国际关系的期望与设想（他的世界理想），就越重要，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不难想象，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不济的国家，无论其利益何在，也无论其对于世界的走向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期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他也主要以一个被动的角色存在，只能顺应潮流，而不能主导历史，甚至仅仅是影响历史潮流都很难。因此，这样的国家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将大国外交放在外交活动的首要位置就是明证。而我们知道，对外的软实力，首先依赖于国际社会对一国的了解，只有了解了之后才会做出评价，进而可能产生认同。如此，一国的软实力才可能得到提升。正是中国迅猛的

经济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促使世人对中国的世界理念,乃至国内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产生兴趣,然后才出现多国政治领导人、学术界、智囊等对中国的外交理念的认同与支持。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申明自己的外交理念就没有意义。

20世纪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创立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然后才会追求爱、尊重、自我实现等社会需要的满足。而我们知道,生存需要主要依靠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体的需要表现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国家首先需要发展经济实力(对于总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来说,民众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调整分配制度,将财富转移给贫穷者来达到),然后才可能造成大众愿意追求某种社会价值的局面,从而才可能用思想和价值观来动员民众,软实力的作用也才会充分释放。古人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表达的就是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国对内软实力的提升,也需要以硬实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

二、软实力的提升是硬实力发展的前提

生产力对文化、制度等因素具有依赖性,或者说文化、制度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这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推动作为前提的文化、制度等因素的演变,生产力才能为自身建立新的平台和空间,其进一步的发展才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观念与习俗的某些转型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文化前提。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发现,没有一系列制度的变迁,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将是“不可能任务”。中国的改革开放,则以切近的事实有力地宣告:适宜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实力迅猛发展的基础。美国耶鲁法学院法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指出:“按所处时代衡量,历史上所有超级强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极为多元和宽容的。实际上,在所有



事例中，宽容是实现霸权不可或缺的因素。令人吃惊的是，帝国的衰落多次与不宽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因此，要获得全球主导权（即：一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超级强国），宽容是必要条件。”宽容是一种体现于国家政策、制度和文化之中的态度，也是一种价值观。这两句话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强权对于宽容的依赖性。如果提升一个层次来说，就是硬实力对于软实力的依赖性。

实际上，即便软实力仅仅是指一种对外的能力，它对于硬实力也具有同样的功能。一国文化吸引力的提升会增加国外对本国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而拉动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对相关产业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最终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还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助于实现持续的经济强大。在这方面，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的影视产品受到很多国家的民众的欢迎，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将发展文化产业当作一种国策，希望将其打造成本国的支柱产业。另外，政治价值观和国内政策也通过国际渠道影响到一国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指责，欧洲还因此而多年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这就或多或少会迫使中国花费更多的财力于武器研发，从而挤占了用于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资金。

实际上，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等本身就可以维系其吸引力，不仅不会因为经济实力的下降而迅速削弱，而且这种独立性还为它们反作用于一国的经济提供了基础。满清末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洗劫了圆明园。这件事情就说明当时中国的落后并没有削弱中国文化对列强的吸引力。二战结束以后，原本实行独裁统治的德国被分为两个部分，西德在美国的控制下逐渐建设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今，即便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撤出德国，其真正的民主政治依然保存了下来，成为德国人自己都要维护的政治制度。韩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说现在美国依然保持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但是那也不是为了防范韩国民众反对和抗拒其本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实际上，韩国正希望这样的强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受

“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侵犯。一种外来的思想和制度一旦扎下了根,就或多或少不再需要来自外部的一如既往的维护,而且会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环境因素,对社会各方而构成影响。正是这种效应,巩固了一国的文化实力进而经济实力,甚至可以帮助一国走出暂时的低谷,重新迈向繁荣。

软实力不仅通过上述方式作用于硬实力的发展,而且还通过体现它、承载它的资源基础直接为硬实力的发展作出贡献。上文指出,文化产业和环保产业就是一国的软实力资源基础,同时,它们又是一国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两大产业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也提高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实际上,这类产业为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最直接的通道。

三、硬实力的发展为软实力要素的合理性、先进性提供证明

在发展软实力时,硬实力也不能偏废。也就是说,硬实力也像软实力一样,是人们追求的一种价值。而作为价值的硬实力,起着衡量软实力的作用,构成一国软实力强弱的标志。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如前文指出的,软实力的提升为硬实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甚至构成作为硬实力主要构件之一的经济实力的发展情况的“文化前提”。具体说来,经济实力的强弱与否取决于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国民素质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无形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人们也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因此,硬实力的强大证明了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国民素质等资源的合理性或先进性,从而增强了这些资源的吸引力。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因为领略到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以及这种军事实力与其制度之间的联系,才认识到西方制度与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产生了学习两方的宪政制度的想法和运动。倘若西方世界没有在军事、科技上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压倒性的优势,那么,中国人很可能一直沉浸在“天